

臺灣與南韓民主化過程中的國際面向分析

作者：胡佛、朱雲漢、文正仁（Chung-in Moon）

譯者：李文志

今日所有從事民主化研究的理論學者已經逐漸認知到，國際作用的分析是進行理論研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①，任何輕率地嘗試將國際因素劃歸為次要或是附屬的影響變數的類型化研究，均是太過簡約化的作法^②。然而正如普利漢（Pridham）所指稱，大部分的類型化理論乃是以民主轉型的模式與成果為判準，企圖彰顯出國內勢力所具有的決定性解釋力量與其預測的效果^③。雖然近來學術界已經明顯地嘗試填補此一研究上的空隙^④；然而，他們的研究標的卻仍侷限在南美、南歐，與東歐等地區，而明顯地忽略了東亞^⑤。因此在本篇論文中，我們將針對兩個東亞的新民主化國家——南韓與臺灣，從事實證分析，以填補前述遺憾。

壹、理論上的考量要點

近年來全球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的情境變遷，對南歐、拉丁美洲、東歐，與前蘇聯等地的民主轉型過程均提供了高度的支援助力，而這些情境助力卻是在第一波甚至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中所罕見的。這些外在或是跨國性的勢力之所以能在第三波民主化風潮中持續扮演如此廣泛的角色，其理由有數個^⑥。首先，自由民主已然成為全球意識形態體系中最具優勢性的正統典範。林茲與史提芬（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就指出，民主理想乃是當代精神所繫（zeitgeist）。截至一九七〇年代末期，雖然回教世界部分地區已有有基本教義派的復甦，但環顧全球，民主仍然是政治體系中最重要意識形態典範^⑦。在全球一片大力鼓吹民主化的風潮之下，此一空前未有的歷史情境產生了擴散效應，對現存的獨裁政權施壓，並且促其放手一搏而成功地轉型至民主政體。

另一個相關的發展是自一九六〇年代中期開始，一連串由國際體系中最具影響力與權勢的行為者所主導的政策改革，也積累出多重的壓力與誘因，從而不斷地啓迪民主。以往，天主教廷經常包容各獨裁政權，甚至賦予其政權上的正當性。但在若望保祿二世繼位後，教廷改採反對獨裁政權的立場^⑧。而以往先進民主國家對於是否要將民主體制推廣至各國，也一直抱持著模稜兩可的態度，更將其視為策略性利

益的考量，而支持獨裁政權，甚至助其推翻民選政府^⑨；此一情勢自一九七〇年代晚期開始有所轉變。從美國卡特總統以人權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基調開始，美國即持續地對外國增強民主化的壓力與協助。歐洲共同體於一九七〇年代晚期也開始改變其會員政策，並於一九八〇與一九九〇年代間持續有力地贊助東南歐地區的民主發展^⑩。最後，由於戈巴契夫在蘇聯全境推行改革政策，並放棄布里茲涅夫的教條主義，因而開啓了境內各共和國的民主化大門。

第三、近年來傳訊科技上的突飛猛進，對於第三波民主化的發展亦具有極大的意義；特別是它縮小了時空的距離，更打破了國內外地域的區隔。由短波收音機、衛星電視、傳真機，與電腦網路等傳訊工具所合力建構出的世界，已大幅地削弱威權統治者掌控境內外資訊理念流通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傳訊科技的發展擴大了示範效果，並加速了「雪球效應」(snowballing process)；任何一個成功的民主轉型範例均可立即為他國，特別是另一個文化近似或鄰近區域的國家(culturally similar and geographically approximate)所仿效^⑪。因而在全球政治家、知識分子與眾多民衆的心中，深植出一場世界性的民主革命意象。透過現場轉播，各類引人注目的民主抗爭與獨裁迫害事件迫使工業先進國家不得不將偏遠地區的人權議題納入其外交政策議程，並且獲致世界各國的重視。這些發展在以往都是不可想像的。

儘管要在國際環境中找出這些有力的影響情境並不困難，但是想析論出這些環境因素對民主轉型過程所產生的實

質作用與影響，卻必需同時從理論與實證兩方面全力以赴方可為之。因此到目前為止，只有少數論著可以完整而有系統地詮釋各類不同形式的國際行為者與勢力，為何且如何地對於不同國家，在不同的時空遞移的轉型歷程中，發揮出各種不同程度的效應。這都是因為國際環境在本質上具有相當的複雜性，特別是由此產生的因果效應乃是由各國以一種無從預測的方式運作(working in mysterious and unintended ways through ostensibly national agents)^⑫，故這些國際環境因素均難以從表象上明顯辨認，遑論其易為國內的結構因素所掩蓋掉。因此國際環境的因素雖然重要，卻不足以主導民主轉型的歷程；許多潛藏於結構中的影響因素，只有在特定情境中方能突顯出來。也唯有透過全人類的努力，以及各類政治勢力的策略性互動，與政治上的領導與判斷，民主轉型方能確實地獲取進展。因此為了釐清這些結構、制度與相關選項之間的關聯性，吾人必需找出所有變遷過程中的行為主體與關鍵要素。

為了排除前述各項理論與實證上的困難，吾人首先必需由三方面著手。第一，正如普立漢所言，吾人必得解析出涵蓋於國際環境中的各項變數，其中包含有許多不同的國際行為者、國際體制，與情境變數等；此舉將有助於釐清(1)背景或環境變數，(2)不同的國際行為者，以及(3)外來勢力的運作形式與發展方向^⑬。其中所謂的背景變數，至少包含：地緣政治的策略發展態勢，國際經濟的動態變遷，急速變動中的強權結盟形態，以及某一國家在更動外交政策後所引發的各

類壓力等。而國際行為者則指涉國際組織、外國政府、非官方的國際行為者，與無特定國家認同的族羣團體。至於外來勢力的運作形式則涵蓋了許多的可能態樣，諸如從各類詳細的企畫乃至於無從測知的作用力（如市場力），從強制性（如侵略或占領）到勸誘性的策略運作，以及從地下運作乃至於訴諸檯面上的顛覆活動等可能。然而，並非所有的外來勢力對於國內的民主變遷都可以產生正面作用；有一些對民主化也可能產生負面或是阻礙的效果。

第二，吾人必需解讀國際因素與國內變遷過程之間互動的動態連結過程。這些連結模式或許是以常設性的國際條約與協定、國際組織、安全協定等方式呈現，也或許是國際借貸與捐助、經貿關係、海外移民，以及教育、宗教與文化的聯繫，又可能是國外傳播媒體的資訊透露、各行為者針對區域性議題的歧見，以及國際間的種族問題等等。這些連結模式界定了國內結構中的行為者對外來勢力的認知與感受，甚至因而必然地呈現出國內結構的弱點。最重要的是，它們制約了國內行為者對國際行為者與外來勢力的認知與期待方面的預設立場，從而決定了國內行為者將國際面向考量納入政策考量的程度。

第三，吾人應針對各國實例建構出一個過程導向的實證性分析；在這個研究架構中，透過區域內外國家的比較研究，確實地認知國際因素對國內政權轉型所發揮的實質影響。

從而，吾人方可以下列兩個步驟從事個案研究。首先，

吾人可基於區域性的比較研究方式，提出一些細微的前提假設，據以從事南韓與臺灣這兩個亞洲新興工業國家在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國際面向分析；其次，則詳加檢視兩國政體轉型的動態歷程。就區域性的比較研究而言，吾人將特別強調此二國發展的近似特徵，並以此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民主轉型個案作一比較。至於在個案研究上，吾人則將致力於舉出區域內部的差異性與各國的特殊歷史情境。

貳、比較觀點下的南韓與臺灣

國際因素的影響作用可被歸納為以下五種主要類別：(1) 示範效果，(2) 透過主要貿易夥伴的政策與市場力作用下所產生的外在經濟誘因、限制與國際情境的效果，(3) 經由理念傳播、多國籍組織的贊助，以及美國貿易政策的等多方滲透下所產生的全球性經濟自由化趨勢的影響，(4) 跨國行為者的角色，以及(5) 源自分裂國家的歷史遺緒（legacy）所產生的多面向意涵。

吾人首先可以發現，所謂的「民主化傳染風潮」（democracy by contagion）¹⁴在東亞國家並未激起太大的回應。與東歐國家的轉型個案相較，無論就其地理位置與威權體制的崩潰時機而言，南韓與臺灣在其政體轉型的最初階段，並未受到雪球效應的影響¹⁵。由於地緣距離太過遙遠，無論是南歐或是拉丁美洲的轉型事例，均無法對臺灣的國民黨政權或是南韓的全斗煥政權發揮任何實質的示範效果。甚

至，當蔣經國於一九八六年底決定包容民主進步黨的成立，並隨即宣稱中止戒嚴和解除多項經年的政治限制，以表示將結束長期的威權統治時¹⁶，除了日本是東亞地區唯一穩定的民主政體外，即使是菲律賓馬可仕政權的崩潰亦無法證明東亞地區將邁向全面的民主化。一九八六年二月馬可仕政權的崩潰確實激起了韓國漢城人民對「民權」的渴求，從而促使反對黨擬定步驟，組織羣眾運動以迫使軍政府從事徹底的改革¹⁷。但是韓國的民權運動也不足以產生足夠的擴散效果；一九八七年中的漢城政治危機對於臺灣或東亞其他國家的政體轉型過程並無顯著的影響。儘管在一九八七年的下半年間，由民進黨所組織的街頭運動如風起雲湧般的興起，但是從一九八七年底到一九八八年初，由國民黨主導的政治改革步調，卻主要是源自內部的繼承危機，始推動而成¹⁸。故而，吾人可以得知，前社會主義集團在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〇年間的民主化浪潮，以及南歐與部分南美國家的民主化進展，的確構成了一個全球性的風潮，強化了南韓與臺灣兩國民主勢力的信念，從而有力地協助兩國完成其民主轉型。但由於東亞大部分地區仍未受此民主風潮所及，故整個政治情勢仍然是有利於兩國的威權統治的¹⁹。

其二，在不同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民主轉型歷程中，各類的外在經濟誘因與限制所能發揮的效應也有著極大的差異。例如歐洲共同體對於東歐或是南歐國家以加入會籍所可以期待的利益誘因吸引之，有效地以民主體制主導其政局發展。然而在東亞地區卻缺乏任何多邊性組織、或單一行爲

者，可以扮演近似歐洲共同體的角色。一九八〇年代間，美國與日本一直是南韓與臺灣兩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但由於這兩國首重其地緣戰略與商業上的利益，故極力地避免運用其潛在的強勢經濟力量，促進南韓與臺灣兩國的民主改革。因而，即使是臺灣在一九七九年間曾經發生高雄事件，南韓亦於一九八〇年時爆發光州事件，兩國的最惠國待遇亦未因此而受剝奪；而除了某些與勞工實務以及與工會法相關的項目之外，美國也未曾將人權議題排定於與南韓及臺灣兩國的雙邊貿易協商的議程之上。但是從一九九〇年代初期開始，由於南韓與臺灣對東南亞區域內的非民主國家、或半威權統治國家的雙邊貿易量激增，相對地降低了對美貿易的依賴程度²⁰。因而，在南韓與臺灣兩國最具關鍵性的政體轉型期間，美、日兩國發現，區域或國際性經貿關係的重大進展，並不必然需以政治上的民主化為前提²¹。

更重要的是，南韓與臺灣不同於大部分的拉丁美洲與東歐諸國，它們之所以進行政治開放並不是起源於任何重大的社會經濟危機，或是遭逢國際市場震盪的風險。此外，在兩國的民主開放時期，民間也未提出廣泛的社經革新需求²²。與同等工業化時期的拉美國家相比，南韓與臺灣由於以體制主導經濟發展計畫，故獲得了極廣泛的社羣支持。換言之，由兩國的舊威權政體所採行的出口導向工業化策略不但極其有效，更已被高度的建制化²³。無疑地，南韓與臺灣藉由快速的工業化與強勢的經濟成長，累積了廣泛的社會與政治的動員能量，從而促進了兩國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與一九九〇

年代初期時所進行的民主轉型²⁴。然而，這項經濟策略上的遺緒卻也在許多方面卻成爲限制兩國民主轉型歷程的阻力²⁵。單就國際面向的觀點而論，兩國在民主轉型的初期排除了各類經濟因素的影響，諸如受限於海外經濟援助的條件制約，或是經濟轉型上的協助等。然而，國際間市場的作用力依舊對於南韓與臺灣兩國的反對勢力的策略運作，產生了一些難以捉摸且負面的影響。在出口導向工業化政策的運作下，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總體經濟需求必然受制於國外經濟實體的需求而定，但是國外的需求卻又高度繫於國外經濟實體是否可以預測國內短期間的政治態勢而定。任何一國只要出現些許社會或政治上的騷動，數以億計的外國訂單極可能就因此喪失，而爲其他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生產者所得。因此除了先進工業部門的投資者只重視能否預知長期政治情勢的發展外，大部分的出口導向部門中從業人士的經濟利益，均繫於長期，甚至是短期間的政權穩定與政策發展的可預期性。因此，東亞國家之間激烈的經貿競爭，以及前述的殘酷現實，對於反對團體的政治策略產生了相當大的侷限性。除非人民確信激烈的政治抗爭可以迅速得到具體的成果，否則引發羣衆動員並造成長期政治騷動的民主抗爭是很難獲取廣泛的民衆支持。

其三，與第三波民主化風潮同生的全球性經濟自由化趨勢，不但直接導致全世界社會主義政權的崩潰，對於南韓與臺灣兩國的民主轉型也發揮了出乎想像的正面效果。整體而言，這股新自由主義浪潮在結合了許多相關機制後，已經逐

漸解構原有的「發展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²⁶，重創支持固有政權的「發展主義者」(developmentalist)聯盟，並促成一個更具有自主性的民間部門的出現²⁷。以南韓爲例，全斗煥政權在最初五年間所實施的第五個經濟與社會發展五年計畫，本質上即是新自由主義的表徵；透過接受美國教育的本土經濟學者，與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諮商人員的大力協助，此一計畫展現出貨幣主義學者的經濟管制理念²⁸。但是這些強調要恢復經濟穩定、增強國際競爭力，並且企圖贏取沈默大衆的政治支持的經濟改革措施，卻引發了農民、工人與民間企業部門的反對與不滿。原本共生共存的「國家—企業」關係，如今已不再順暢，彼此間更是爭議不斷²⁹。由於此項經改措施不獲民心，終於導致執政的民主正義黨於一九八五年國會選舉中挫敗，預示了第五共和的結束³⁰。

在此同時，由於在一九八〇年代後期美國國內要求調整貿易政策的政治聲浪已日漸升高，美國貿易代表署因此挾著「一九八六年貿易法案」(1986 Trade Act)此一利器，對南韓與臺灣施予強大的壓力，迫使兩國進行全面的貿易自由化，並解除金融規範的限制³¹。對南韓與臺灣而言，這類由外國勢力所推動的經濟改革，不但剝奪了國家官僚掌控民間企業發展的能力，更侵蝕了國家官僚體系裁定分配「經濟租」(economic rent)的權力。結果這些國際性的政策變遷一方面削弱了舊政權的政治基礎，另一方面也解放了企業部門，使其不再必須宣示其政治上的忠誠度，而得以脫離執

政菁英的掌控。

在促進南韓與臺灣的民主開放歷程中，有數類的跨國行為者均扮演著不可忽視的角色。例如，除了學生之外，南韓的民主勢力便與許多國際間的非官方組織形塑出不同的跨國聯繫網絡；其中，尤以教會團體最為積極。而在臺灣，長老教會也持續地對政治異議分子提供精神與物質上的雙重支持。在兩國實行威權統治的期間，若干激進的國際人權組織，如亞洲觀察（Asia Watch）與「國際人權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等相關團體，均嚴密地監控兩國所發生的政治迫害與蔑視人權等情事，從而喚起全球對於兩國民主運動的關注。而其他的非官方組織，特別是「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則在兩國的自發性民間社會的發展初期，提供了大量的協助。此外，無論是南韓或是臺灣內部的民主勢力均受到海外，特別是美國僑民團體的大力支持。這些僑民團體一方面努力地與國內反對勢力的政治領袖與反對團體建立緊密的聯繫，並對國內提供精神與物質的雙重支持，他方面則積極遊說美國國會與行政部門，深盼美國能對此二國採取更果斷的人權政策。

最後，這兩個民主化案例的最主要特徵，既不是因為它們都是東亞國家，也不是因為它們均屬於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一員，而是在於它們都繼承了分裂國家的遺緒。在釐清分裂國家所蘊涵的特質與意義，以及這項特質對民主轉型所產生的制約性影響之前，吾人應先審視另一項制約條件，也就是「國家的統一與被國際社會所公認的領土疆界，乃是邁向

民主化的先決要件」^⑩。但是對於分裂國家而言，這個民主發展的制約性背景因素在定義上卻存有著極大的爭議。

分裂國家的現狀產生了許多的連結機制，而這些機制也使得政權的穩定性高度受制於外來勢力的運作。首先在冷戰情勢下，朝鮮半島的割裂與臺灣海峽兩岸的分隔都是東北亞地區勢力配置的一環^⑪。冷戰時期，南韓與臺灣各自面對著來自共產敵對政權立即的軍事威脅，因而高度仰仗美國強權的防衛協定以維繫其政權的存續。美國在南韓的「前進基地」（forward base）與「中美協防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以及後續較不具保障效用的「臺灣關係法」（the Taiwan Relations Act））都在兩韓與海峽兩岸間發揮了穩定的功效。因此，由於兩國政權當局者必需具備能力，以防範敵對的平壤政權，或是北京政權的統一野心，方得有效執政，故而兩國政權的穩定性均受制於此一區域內各主要強權的結盟策略，與國際體系中任何的結構性變遷等因素。因此無論南韓與臺灣兩國的現行政權是威權，或是民主政體，美國均可以優勢的彈性外交策略操控其運作。

其次，在分裂國家的狀態之下，任何的民主轉型都必需擔負敵對政權進行干預的風險。而政體轉型的意涵與結果的不確定性，尤其是國家統一遠景所引發的民間反應，以及對國際政治秩序所蘊涵的動盪效應，也都可能激起敵對政權的過當行動。

第三，對於南韓與臺灣而言，分裂國家的現狀更凸顯出

國際成員對政權正當性的重要影響。由於兩國在領土疆域上只具有暫時的宣示效力，因而其主權地位無法獲致國際社會法制上的完全承認。二次戰後，南韓與臺灣投注了大量時間與其敵對政權競逐各國的外交承認，以及在主要國際組織中的唯一外交代表地位。因此，外交政策的成效便直接有力地影響到政權的存續；外交上的孤立極有可能削弱現存政權的正當性，但若贏得國際社會的承認則可以強化政權鞏固的力量。這也就意味著在政體轉型的過程中，國內的各個行為者在進行政治策略的採擇時，必得納入國際面向的考量。

在南韓與臺灣內部鞏固民主的過程中，分裂國家的現況也造成了許多潛在的嚴苛挑戰。首先在國家結構上便造成了一種模糊性。任何一個政治實體中，只要在其內部對於國家認同與國土結構出現激烈的衝突爭議，其民主體制便無法鞏固⁴¹。前南斯拉夫曾出現的混亂局勢與屠殺便是一個明證。而「國家定位」的議題，也使得兩國內部無法就憲政體制的發展達成共識。一個避開此種爭議的可行辦法，是藉由國際間的多邊承認，以及與敵對政權之間的相互協定，將兩國當前的國家分裂情勢予以法制化；而此一辦法是否能夠達成，將對國內的民主發展前景產生深遠的影響。

此外，由於國防安全上的顧慮，長期以來南韓與臺灣均以軍事與安全體制主導行政體制的運作。來自敵對政權的長期軍事威脅以及國內由共產黨支持的暴動，為兩國提供了一個合理化的基礎，使其得以維持一個龐大的軍事安全體制，並可藉此干預行政事務。兩國社會由於深具此項軍事化特

質，因而為威權政體創造了有利的政治環境；而為了維護國家內外的安全，「新專業化主義」(new professionalism)的需求更賦予軍隊一個樞紐性的角色⁴²。正如同拉丁美洲國家的先例一樣，如何去除掉南韓與臺灣內軍事安全體制的政治性色彩，將是成功鞏固兩國民主體制的最主要挑戰。如若無法除去軍安體制在憲政制度上的特權地位，並根本重整軍事與行政部門間的編制關係，所謂的新民主是無法鞏固的。

為了實際釐清分裂國家的衆多遺緒，以及相關的地緣政治態勢對兩國的政體轉型的影響，吾人將採行一種過程導向的實證分析。下兩節中，本文將分別就南韓與臺灣詳細檢視其政體轉型歷程中國內外行為者複雜的互動模式。本文並將指出，雖然臺灣與南韓在國際體系中有著相同的處境，但是由於兩個分裂國家的形成原因根本不同，故而與南韓的轉型經歷相較之下，分裂國家的現況對於臺灣的民主轉型努力產生了更強的抑制效果；同樣地，冷戰結束後所引發的政策性混亂，也對兩國的政體轉型發揮了絕然不同的影響。

叁、對於南韓民主化過程國際面向觀察

南韓的國內政治動態始終與國際環境的變動息息相關。自從一九四五年獨立之後，南韓經歷了諸多不利於民主發展的歷史變遷創痛；日本殖民時期的遺緒、國家的分裂，與蹂躪國土甚深的韓戰等，無一不削弱戰後南韓的政治發展基

礎。更甚者，例如與北韓的軍事對峙所導致的不安全感以及國內普遍的貧窮與低度發展，亦成為威權政體統治的成長溫牀。但在此同時，來自國際社會的認同與國際資訊的傳遞，以及國際社會團體勢力的進入，依然對南韓政治發展的本質與方向發揮一定的作用。故而一九八七年的民主轉型絕非是突發事件。

民主轉型的過程

有些人將南韓進行民主轉型的原因歸結為南韓社會的結構性重組：發展的過程一方面強化了民間社會的政治力量，也擴大了人民從事政治運作的空間。甚至，全斗煥的新保守主義式的改革更塑造出一種政治情境，使其不須藉由任何團體的支持即可成為政治領袖^⑮。其他人則從文化的領域中發掘出決定民主開放的因素：施行了三十年的現代化與社會革新，已然改變了南韓的政治文化，人們也已逐漸認同民主的價值，從而反抗威權統治^⑯。在上的領導班子只得作出折衷的選擇^⑰。一九八七年的民主開放即是全斗煥政權受到反對團體及文化變革的箝制所做出的折衷選擇。但是在此同時，吾人也不應該忽略了外在因素對南韓民主開放的重要影響。

來自北方的軍事威脅與國家安全的實質考量，一直是南韓軍隊用以介入文人政治與實行威權統治的主要藉口。然而，國家安全已不再可以成為軍人干政的藉口。一九八六年後，國際間與區域性的安全體系均被根本地重組。戈巴契夫的改革開放政策為美蘇兩大霸權國家之間的敵對態勢畫下了

句點。中國大陸也因為正加速推動經濟上的門戶開放政策與經濟結構的改革，無暇對朝鮮半島施以嚴重的軍事威脅。更重要的是，來自於北韓的軍事威脅也減輕了。南韓對北韓所採行的地位對等政策，長期以來美國對南韓在安全上的保證，以及北韓在經濟發展上的停滯與在外交上的被孤立，都形成南韓民主轉型過程中最有利的安全情境。因此當權者與軍方都無法再以國家安全的理由，否定民衆對於民主革新的需求^⑱。

與此同時，來自於美國的壓力也非常重要。對於南韓的民主政治，美國的立場一直是搖擺不定的。儘管美國一再宣稱其維護民主的決心，但仍常放棄前述堅持轉而支持南韓的威權政體。南韓於一九六一年所發生的軍事政變，以及一九八〇年全斗煥的接掌政權都是最好的例證。由於美國一方面受到外交上的限制，不得介入南韓國內政治，在實質利益上又希望南韓政局穩定，因此限制了美國的權力運作，而難以防堵威權統治的可能性，並主導民主改革。然而，在一九八七年間的民主轉型中，美國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場。早在一九八七年二月六日，美國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席格爾（Gaston Sigur）對南韓發出了一項嚴正的警告，強烈敦促全斗煥政府必需塑造出一個「更加開放、且更具正當性基礎的政治體制」，以強化美韓雙邊關係；他更強調政府文人化（civilizing）的重要，並促請南韓軍隊回歸其維護國防安全的「原始使命」（primary mission）^⑲。五月，國務卿舒茲（George Schultz）訪問漢城，傳達華府對於南韓民主革

新的支持之意，並表示全斗煥總統應致力於和平解決修憲爭議的僵局。雖然如此，南韓的政治情勢依舊每況愈下。正當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八日暴動已達頂點時，美國雷根總統致函全斗煥，敦促其避免使用軍事鎮壓示威羣衆，並且與反對黨恢復對話，以期逐步地建立完全的民主政治^①。六月二十三日雷根再派遣席格爾至漢城觀察政治情勢，以求找出危機解決之道^②。而美國國會更對南韓執政當局施予強大的壓力；參、衆兩院均通過決議案（H. Cong Res. 141 / S. Res. 241），呼籲南韓朝野恢復協商對話，討論修憲議題，以促進南韓政治體制的民主化。

雖然南韓的民主成就在本質上並非是由雷根政府與美國國會的雙重壓力所指揮得出，但此種壓力卻有力地迫使全斗煥作出妥協。美國此次所以堅定支持南韓的民主改革，主要是基於兩個理由。第一，支持南韓的民主改革可以消弭廣大南韓人民心中因為光州事件、美國對全斗煥政權的扶持、以及美韓雙邊貿易摩擦所產生的反美情緒。第二，美國的外交政策也正進行一場深遠的變革。菲律賓馬可仕政權的敗亡給予美國一個深切的警惕，美國終於認知到，以維持現狀之名而盲目支持一個貪污的威權政體，對於美國的實質國家利益未必有益。雖然南韓的政治情勢不同於菲律賓，但道理仍是相通的。

如果說美方的壓力有效地抵制了全斗煥對民主開放的抗衡，則一九八八年漢城國際奧運會所引發的政治效應，則對執政當局中的強硬派構成另一個重要限制因素。全斗煥政權

一直認為，主辦一九八八年漢城奧運會乃是其最偉大的外交成果之一。但是一九八七年後，各地發生的民衆示威衝突卻反使全斗煥政權陷入困境。倘若全斗煥政府以強制性的措施平息民主運動，將嚴重地損及全斗煥政權在國內外的形象，從而引發國際間抵制參與奧運的可能性；這是全斗煥政權最不願見到的情況。因此對於全斗煥而言，妥協安撫國內的政局乃是其最明智的選擇；如果全斗煥僅為了尋求眼前的勝利而採行軍事措施鎮壓民主運動，無疑將危及其政權的永久存續。

正當軍事安全情勢、美國壓力、以及漢城奧運所帶來的強大政治效應，有力地防止南韓執政當局強勢鎮壓民主運動之時，來自國外的資訊與理念則從社會底層結構根本地改變政治社會化的模式，並且形塑出另一股政治壓力。事實上，南韓也趕上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其中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南韓人民已經逐漸認知到南韓政經領域的失調；南韓的經濟雖有成就，但政治體制上卻是處處缺失。從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開始，南韓無疑地已經是中等收入國家中的佼佼者，但是其民主發展的步調卻未能迎合經濟上的成長，南韓成爲一個「經濟先進，政治落後」的國家。腐化已極的國家形象終於點燃了人民企圖改革的怒火。這主要是因爲南韓人民雖然在經濟領域已然超越北韓，但他們更期盼在政治體制上也能較北韓先進，從而彰顯出南北韓在國家形象上的優劣歧異。透過南韓民衆的政治自覺，特別是中產階級化被動爲主動地支持南韓的民主化，南韓人民終於證明了南韓政府的確較北韓

更具有正當性基礎。

除了前述原因外，其他國家所發生的政治革新也加強了南韓人民的不滿。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地的政治都促使南韓人民，特別是知識份子，將其國內情勢與各國對照比較，並因此重新認知民主政體所能帶來的實益。而非律賓馬可仕的下臺則對南韓造成最直接的示範效果。透過電視的轉播，菲國人民的動員力量與馬可仕的下臺在南韓人民心中雖然造成一時的衝擊，卻留下深遠的影響；這個影響使民衆確切地了解到，南韓人民並非一定只能在麪包與選票之間二擇一，經濟上的成果與政治上的革新並非是不能同時獲致的，而民主改革也不再是一個遙遠的理想。南韓羣衆的力量因此被激盪而出。

前述種種的認知與印象固然可以動搖南韓人民的意念，卻仍不足以點燃民主運動的火花。爲了動員民衆投注民主大業，適當的理念引導與組織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在南韓的民主運動圈子中，充滿著各種源自於正統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或是依賴理論的新興意識形態與知識論辯。藉助於這些外來的理念，民運人士結合了工人、農民、學生、異議份子與宗教團體，組成各式鬆散、卻具普遍性的水平式反對聯盟，以強化其組織基礎。這些反對聯盟不同於往日只會浪漫地宣揚自由民主優點的民運人士，他們的意識形態極爲明確，並擬定詳盡的策略目標，其行動計畫也經過周密的思考。多年來這些外來的理念終於爲人民民主改革注入了新動力。此外，國際間的非官方組織與海外

韓橋對於南韓的民主開放也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④。

綜觀此項民主改革歷程，南韓的民主轉型並非是一項只涉及國內政治變動的單一事件，它同時也是受到外在勢力變遷影響下的產物。當有利的國家安全情勢與美國的壓力、南韓奧運的舉行等三項國際性因素同時壓制了威權政體策略運作的空間時，由南韓社會與人民對政經情勢認知上的不滿、理念的傳播、以及國際間民主聯盟的形成所構成的國際化趨勢，對於南韓的民主轉型發揮了關鍵性的催化效應。

國際體系對民主的鞏固與未來遠景的影響

一九八七年的民主開放對於南韓的政治體制、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以及反對聯盟的組織結構都產生了根本性的變革，並自此開始進行廣泛的制度重建工作。一九八七年十月所通過的修憲案將總統選舉制度由舊有的間接選舉改爲直接民選，並於當年十二月舉行大選。在四路人馬的角逐之下，盧泰愚以36%的選票贏得了此次選舉。但在一九八八年四月的國會大選中，執政的民主正義黨卻未獲得國會席次的穩定多數，可見自由而公平競爭的選舉制度已經在中央與地方的各級選舉中獲得落實。而盧泰愚於「六二九民主化宣言」中所承諾的政策改革也一一地實踐：實施地方自治，設立各地方（鄉、市）議會與省議會，並舉行全國性的大選；廢止原先用以控制大眾傳播媒體的法制性工具——「言論基本法」，使得集會結社與言論表達的自由獲得制度性的保障；釋放所有政治犯，並且重修或廢除所有有害的法條^④。

民間社會也就隨著前述各項改革而大幅成長⁴⁵。各類利益團體紛紛成立，而地方性的工會團體數目也顯著的成長。為了反制與執政當局結盟的舊有社團，這些公共部門積極地鞏固早期的地下組織；教師、農民、知識份子、工人、與記者們都組成新的利益團體，以抗衡由政府所控制的舊利益團體。最後連都市裡的小販與藝術工作者也組成了新利益團體。而數個涉及經濟正義與環保議題等特殊議題的公共利益團體也逐漸地展露其發言地位⁴⁶。因此在這個民主轉型的過程中，民間社會不但得以擴張，更逐漸地分化為保守與激進兩個對立陣營。更甚者，經歷了民主開放的南韓民間社會愈形敏感而激進，民衆抗議與工人罷工的次數急遽升高。在一九六〇與一九八〇年代兩次的政治開放歷程中，南韓社會都出現了過度擴張與失控的緊張情勢⁴⁷。

民間社會的擴張、與社會中日漸瀰漫的政治激進主義，以及民主制度的有限性，都使得國家對社會的支配能力受到限制⁴⁸。民間社會不再馴服於國家以嚴密的統合主義所操控的形式選舉與脅迫之下，新的政治多元主義破除了發展中國家的迷思；國家機關的自主性、行政權的優勢、官僚體系的獨立性，與決策機制的中立性等政治體制上的議題，都一一地被民間社會提出、質疑。集體利益的邏輯成為民間社會對執政當局在政治對話與政治行動中的首要規範；以勞工部門為開端，農民、中醫師、藥劑師，與學生等整個民間社會都為了爭取團體的個別利益，而集體投入了社會運動之中；而地方自治所造成的政治權力下放則開始危及中央與地方之間

應有的協調機能⁴⁹。

如同國外的先例，南韓的民主轉型過程也呈現出一種不確定與危險的特質。短期而言，民主轉型引發了社會的混亂失控，並為日後出現的社會重大危機提出警訊。對此，盧泰愚政權提出「保守大聯合」的策略以因應之，拔擢以往的政敵金泳三與金鍾泌進入領導班底，並且將三大黨合併，另創一個「民主自由黨」。盧泰愚此舉乃是為了確保執政黨掌握國會的穩定多數，並將原有的四黨競合體系轉變為兩黨政治，以孤立金大中的和平民主黨，使其成為唯一的反對黨⁵⁰。然而在一九九二年的總統大選中，這個兩黨對峙的競爭情勢再度被打破，由現代集團總裁鄭周敏所成立的統一國家黨將政黨競爭轉變為三黨競爭的情勢。此次選舉的結果，由金泳三當選總統，而執政黨也在國會大選中繼續維持穩定多數。雖然執政黨連續贏得了這兩次選戰，但是南韓的民主轉型仍然無法擺脫政黨競合分立，與不穩定的政治聯盟結構所帶來的危險。

儘管有些人對於南韓民主轉型的前景表示悲觀⁵¹，但是金泳三的就任與其積極從事的政治革新已一一地否定了上述的臆測，有效鞏固了民主體制。金泳三所致力之全面反賄選活動，以及執行延宕許久的財產登記制度，都為新政府累積了良好的信譽，從而獲取公眾的信心。此外，他更完成舊政府所未竟的制度改革，如修改選舉法與公職選舉獻金法、舉辦地方政府首長選舉，並肅清了軍方的當權派，大幅地降低軍人干政的機會⁵²。

然而金泳三的改革似乎尚不足以確保民主體制的鞏固，若干來自於國內的障礙再度浮現。保守派的反擊減緩了政治改革的步調。黨派的歧異與變動，以及舊日個人主義政治與地方政治勢力的反撲，對金泳三政權投下了另一個重大的挑戰。由於政黨內部的權力鬥爭，金鍾泌脫離執政的民主自由黨，並籌組新黨，從而創造出一個完整的政黨競爭體制。在最近的地方性選舉中，政治權力的重組也使得往日的地域意識再度復甦；以三金（金泳三、金大中，及金鍾泌三人）為主，立基於個人主義式的地域政治則為日後民主是否得以鞏固蒙上一層疑慮。無論如何，民主體制的鞏固歷程已然無法回頭，因此任何短期間的挫敗未必能導致南韓民主最終的敗亡。

對南韓的民主轉型歷程而言，外在的變數才是最具關鍵性的挑戰。其中首要的威脅就是兩韓關係的發展以及國家統一的模式問題⁵⁵。雖然朝鮮半島問題「越南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越南化」的解決模式如果出現，則南韓的民主轉型也只能隨之中斷。即使是南韓企圖仿效兩德模式，於北韓政權瓦解之時吸納北韓，但仍舊可能引發許多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相互動盪，危及民主體制的穩定。當然維持現狀也非良策。儘管近年來政府致力於文人政治的革新，但是長年以來南、北韓在軍事上高度的緊張對峙，仍舊逼使南韓軍隊成為民主鞏固過程中一個潛在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如何操控兩韓關係的發展將直接關係到南韓民主化的遠景。

南韓為了消弭這個不安定的變數，在盧泰愚政權的主導

下，已經成功地與往日的共產主義宿敵——中國大陸，建立正式的官方關係，並且在與前社會主義盟邦積極建立商貿聯繫的同時，與俄羅斯發展出更緊密的關係。漢城更對平壤方面提出和解說帖，南北韓因而於一九九二年二月間簽訂協議，約定和解、不互相攻擊，以及合作共榮。盧泰愚的「北進政策」（Nordpolitik policies）為其本身政權帶來了諸多的利益，例如：壓制激進派學生運用國家統一的訴求以結合中產階級勢力的企圖，減輕來自北方的安全威脅、成功地加入聯合國，以及最重要的一強化盧泰愚政權在國際地位上的正當性基礎。

肆、臺灣民主發展中的國際面向觀

在臺灣，政體轉型的問題不僅限於政權的正當性危機而已。由於臺灣宣稱其擁有代表全中國的主權地位、領土高權、以及人民治權等，因而引發出國內外對其國家主權是否具備有正當性的質疑。無論是在國際體系或是在國內社會中，戰後臺灣憲法在文義與內容上所特有的模糊不清的本質，一直是最為人所關注的焦點。自從中華民國自大陸撤退來臺之後，政府的主權地位一再地面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主權上的對立宣示、軍事侵犯，以及無止盡的武力威脅等挑戰；無論是北京或臺北兩地都以唯一的中國主權代表自稱，極力地爭取國際社會的認同。直到韓戰爆發，臺灣原本岌岌可危的主權地位獲得美國強權以及其戰後安全協定的支持，

方能穩定支撐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在國內方面，這個由國民黨政權以及長期掌控政治權勢的大陸菁英所建構出的統治結構，其正當性基礎是建立在一連串的基本原則上：中國只有一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中華民國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項「一個中國」原則一直是國家統治結構的正當性來源，同時也是另一套由國家積極運作的精密意識形態基礎；在「一個中國」原則之下，臺灣人民的歷史與國家認同、執政者對國家的定位，以及臺灣人民（包括閩南人與客家人）與大陸外省人之間的省籍劃分，均從此被定為一尊⁵⁷。

但是臺灣這個在國家統治結構上的特徵，最終卻轉變成其政權危機的主要來源。其原因有三：首先，由國家所主導的大中國意識一直受到臺灣本土社會中部分人士的頑強抵抗，特別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家屬，以及受過西方教育的海外臺胞與長老教會教眾等本土籍菁英等⁵⁸。其次，不論是國家結構的正當性，或是國民黨政權的政治地位，兩者都受制於美國的中國政策更動的影響。第三，在臺灣的政體轉型過程中，民主改革所引發的競爭態勢，以及臺灣人與外省菁英之間對於政治權力重分配的爭逐，在國內不可避免地開啓了一場針對臺灣的國際地位以及未來兩岸政治關係的論辯。

民主轉型的歷程

一九七七年發生的中壢事件可以說是臺灣舊政權開始步入衰敗過程的開端⁵⁹。受到中壢事件的鼓舞，反對陣營的候

選人開始認知到執政當局的政權脆弱性，並因此組織一個全省性的反對聯盟。或許有人認為從一九七〇年代晚期到一九八〇年代初期為止，這些風起雲湧的反對運動，乃是源自於各種長短期勢力的互動激盪⁶⁰。但實際上這些反對運動的最主要的動力乃是來自國外。臺灣由於外交上遭逢挫敗，從而喪失了國際地位，面臨國家主權危機的危機，連帶使得原本穩固的一黨威權政體的執政權力也日漸削弱⁶¹。從一九七〇年代初期開始，美國與中國大陸再度進行官方式接觸，從而為臺灣帶來一連串的外交挫敗；儘管國民黨依舊宣稱只有中華民國才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是由於中共重返國際社會，導致臺灣接連失去聯合國席位以及在所有重要國際組織中的會籍，並與重要友邦斷絕外交關係，嚴重地損及國民黨對主權宣示的基礎。由於國際社會仍然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⁶²，因此這些外交上的衝擊令各界開始質疑起國民黨政府是否有能力保障臺灣現狀，並且維繫其國家建制的正當性。

一九七〇年代後期以來，由中國大陸所提出的一連串和平建議也隨著斷交危機而來。國民黨政權因此受到雙重壓力的擠壓：一方面，由中國大陸所提倡的「低盪」（detente）氣氛瀰漫於臺灣海峽兩岸，化解了羣眾心中的危機意識，並削弱了維繫戒嚴法體制的合理性基礎；另一方面，外在環境的急遽轉變也喚醒了部分新興中產階級的政治意識，從而鼓舞了政治反對運動的成長。

儘管反對運動在一九七九年高雄美麗島事件中遭逢打

擊，但是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時，「黨外」^⑤的領袖們依然堅定而審慎地逐步籌組準政黨性聯盟。而為了防範反對運動所可能帶來的政權危機，前任的總統蔣經國則以了一連串的政治改革以因應「黨外」的發展。在蔣經國的最後生涯中，他一手平息了黨內保守派的反對聲浪，將某些強硬派人士調離重要職位，加速進行政治自由化，以及任命一個改革派的臺灣人——李登輝，作為其繼承人。除了政治自由化措施之外，國民黨並亦開始檢討其大陸政策^⑥，由此運作出一套新的政策機制，為未來的政體轉型加諸了更多的外在限制。

蔣經國於一九八八年一月過世，他的死亡加速了國民黨威權體制的崩解。而繼任的李登輝總統則決定繼續進行政治改革，他更試圖跳脫出蔣氏的觀點，嘗試在新的政治基礎上重新鞏固國民黨的政權。在這個政體轉型的過程之中，許多黨外或民主進步黨的領袖們，將人民的族羣認同議題以及臺灣自決的原則直接納人民主化的改革目標^⑦。一九八〇年代後期，隨著政治環境的愈見開放，民進黨內部的激進派人士即不斷地鼓吹民進黨應堅守臺灣獨立的立場；而新世界秩序的建立也促使臺灣獨立的訴求獲得了更多羣眾的支持。這些發展顯示出，臺灣受到蘇聯政權的瓦解衝擊，以及感受到天安門流血事件爆發之後低劣的美中（中共）關係所帶來的有利情勢影響，原本僵化的「一個中國」原則已經開始逐漸地鬆動。此外，東歐集團的崩潰不但掀起各個族羣與國家之間的爭端，更嚴重的改變了許多國家的政治情勢，並破壞了原有疆域的完整性。其中許多例子證明，國際社會是極可能接

受某些族羣全體對於自決、自治，或脫離自原有國家的權利主張。國際間的政治發展為支持臺灣獨立的人士帶來了希望^⑧。而在一九九一年國民大會選舉前夕，民進黨內的新潮流派系在黨大會中大力推動一個黨綱修正案，企圖將臺灣獨立的目標明確地納入民進黨的黨章之中。一九九二年時，由於民進黨認為以往所提出的憲改訴求對於臺灣的主權問題並未明確表態，因此揚棄了前項設計，並且更進一步地制訂了「臺灣共和國」的憲法草案。

然而，民主改革與國家認同之間的衝突不僅在國民黨與反對陣營之間劃下一道鴻溝，同時也造成國民黨內部菁英的分裂。李登輝所採行的新外交政策方針，震驚了許多國民黨中央常委會的資深代表。首先，李登輝派遣一個高層次的代表團至北京參加一九八九年的亞洲開發銀行年會；其次在李登輝的主導下，外交部開始在國際間尋求友邦的雙重承認。在許多國民黨大老的眼中，前項外交舉動無疑是事實承認中共政權，而後者則明白地悖離了長久以來的一個中國政策。因此一九九〇年總統選舉之後，以李登輝總統為核心的人士即被稱為「主流派」；而以行政院長郝柏村為核心，反對李登輝的集團則被稱為是「非主流派」^⑨。非主流派的人士不斷地質疑李登輝棄守中華民族主義，並且阻撓李登輝與民進黨從事任何意識形態上的和解。反之，主流派人士則將非主流派界定為戀棧過往權位，並且寧願認同於中國大陸也不願融入於島上兩千一百萬人民共同體的保守派^⑩。

國民黨內外的這些衝突演變到最後，終於在針對臺灣的

國家地位與國家認同問題上，形塑出兩個對立的意識形態主張；各個競爭勢力以國家作為一個競爭場域，在其中角逐國家機關的執政權力，企圖以此權力樹立出一個新的文化霸權，並以臺灣化或中國化為目標從事建國工作。但由於這些衝突只是理論上對國家主權與疆域結構的修正建議，並非是事實上的實踐，因此臺灣內部關於意識形態的對峙危險，也就不及於造成前蘇聯與南斯拉夫聯邦分裂的種族內部爭議與分離主義鬥爭。但在另一方面，任何企圖修改國家統御結構的嘗試，極可能導致外來勢力的介入危險以及政治取向兩極化的政權危機。

由於各界對於國家認同的議題以及外來勢力介入的威脅問題上各執己見，因此使得執政當局與反對陣營之間，或是國民黨內部領導階層間，更難以透過政治協商達成根本共識。這些協商中的困難如下：首先，政治協商必需以憲政改革的架構為之。由於非主流派認為現行憲法乃是國民政府仍得以有效統治中國大陸時所制訂的，而且憲法乃是一個中國政策的精義象徵，故而堅持只能對憲法做小幅度的修改。而主流派人士則為了避免因廢棄現行憲法而引發各種國內外政治危機，因此傾向對於既存的憲政結構作一實質的修改。至於民進黨則誓言要廢除現行憲法，並強調應制訂出一套可以表達全體臺灣人民意志的新憲法。最後，由於國民黨掌控了新國民大會（1992至1996年）中四分之三的多數席次，因而造成強勢的一黨修憲。

其次，各界對於國家認同議題上的兩極化反應，也導致

各界對憲政制度的設計爭辯多時。以民進黨為例，經過多年的內部爭論之後，其對憲政制度設計的立場已經由責任內閣制逐步轉變為半總統制，最後採取總統制；而最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新潮流派系，也在其他派系的勸說之下放棄長期以來對責任內閣政治的堅持，並深信強勢的總統制設計乃是追求臺灣獨立過程中所不可或缺的要害。許多民進黨領導者相信，總統直接民選將有助於在國際社會中表彰臺灣的主權地位，且可以培育出一種以臺灣為中心的新國家認同意識^⑩。民進黨強調，唯有免於議會監督的強勢總統方足以抵抗中共人士的滲透。而國民黨的主流派，如李登輝等，亦支持總統直接民選，並且希望將政治體制由責任內閣制轉型為半總統制。反之，非主流派則堅持選舉人團制度，傾向維持間接選舉而反對直接民選。非主流派人士認為，直接民選乃是總統擴權的託詞，更可能被運用成為臺灣自決的利器。由於國民黨內部對於總統選舉方式的意見嚴重分歧，兩派在一九九二年全體黨代表大會中因此近乎公開決裂。這項國民黨內部的政治障礙一直到一九九三年一月郝柏村自行政院長卸任，非主流派遠離黨內決策核心之後才得以排除。

民主鞏固過程中的挑戰

臺灣在轉型至民主的過程中克服了许多重要的障礙，而這個民主化過程完成了四項重要成果。第一是憲法的修訂與地方基層選舉的舉辦。臺灣自從在一九九一年五月廢止臨時條款，並進行由國民黨所主導的三階段憲政改革之後，以往

許多阻撓民主代議政治基本功能的法制障礙已經被一一地破除了。從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立法委員選舉之後，各個基層選舉逐一地舉行。臺灣的政治體制展現出一種既開放、又具包容性的新興氣象。即使是流浪海外多年從事於臺灣獨立運動的各政治領袖，也得以合法地回到島內，並參加選舉。第二個民主成果是培育出一個政黨競爭體制；民進黨與新黨^①這兩個真誠的反對黨，在各項選舉中對執政的國民黨政權提出了有力的選舉挑戰。由於反對黨的地位已經正式地為執政菁英所承認，並且受到國家法令的保護，故而這個政黨競爭體制可說是已經法制化了。第三是菁英的更替。儘管民主化並不等於臺籍菁英可以入政治權力結構的核心，但是不容諱言的，卻因此更加深民衆對於民主改革的期待。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立委選戰之後，連戰被任命為第一位臺籍行政院長，這個行政權力的移轉過程便已大致完成。最後，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以各種不同社會運動形式而出現的羣衆動員，則將原本被威權政體所嚴密掌控的民間社會從基層根本地解放而出。知識份子、宗教團體，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公益團體、各職業公會，以及大學生們都在社會運動獲得更廣闊的政治運作空間。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民主化的傑出成就並不是以國家主權的崩潰，或是政治秩序的失控為代價始換得的。

儘管臺灣的民主化過程已經達成前述各項深遠的改革，但是臺灣的民主體制仍未鞏固。以往的民主轉型過程雖然平順，但仍無法擺脫許多負面的影響。首先，憲政制度的改革並不是透過各黨派菁英之間的最後協商而達成。因此朝野三

黨對於現行憲政秩序的本質與運作邏輯依然缺乏共識。倘若執政黨下臺，則現行憲政秩序是否得以存續亦未可知。其次，在這次由國民黨所主導的憲改條文中，仍然可見部分威權體制的遺緒；雖然象徵舊時威權統治的臨時條款早已被廢止，但是其中部分關鍵性的要素，如總統的緊急命令權，與總統府轄下的國安會組織的建制，都被移植到增修憲法之中。在此同時，國民黨的領導高層也放慢了腳步，不再急於將高度集權的國民黨權力結構予以權力下放，並更動黨國體制關係，但是這兩項改革卻是立法院是否得以發揮正常立法功能的前提要件。此外，文人治軍的問題也仍然存在。在總統統率三軍的名義之下，軍事與安全體制仍然可以擺脫立法委員的監督。而透過黨務系統的運作，國民黨依舊緊密地掌控軍事安全體制與三家電視臺，更別提要國民黨放棄其獲利甚豐的黨營事業與專賣的所有權。最後，臺灣的民主前景不但面臨這些議題的威脅，其正當性基礎更受到「金權政治」與「黑道政治」的侵蝕^②。

然而在臺灣的民主轉型中，最棘手的障礙仍莫過於國家認同的議題。正如族羣衝突一般，由於各界對此項議題均各有排他性的正當性理念，此議題在價值意義上又具有特殊的象徵地位，因此「各界均暫時迴避，放棄爭議，因為這是一個難以被輕易地分解議價的整體利益」^③。更甚者，正如同臺灣內部的衝突一般，中共嘗試將其國家建制的觀點——國兩制，強加於臺灣之上；海峽兩岸也各持不同的國家建制主張而形成拉鋸戰。因此，臺灣為求民主化的過程所冒的風

險極可能是難以負荷的。首先，一旦民主過程終將國家認同的問題列為必需要解決的零和衝突的話，民主就將崩潰。其次，未來臺灣的民主發展似乎仍不足以因應中共或中共代言人的政治勢力滲透，以及此項政治勢力與臺灣內部的政治多元主義、少數族羣的人權、正當程序等所出現的衝突。

爲了回應前述各項的挑戰，李登輝總統一直嘗試建立起一個新的國家正當性基礎，以鞏固目前臺灣尚顯脆弱的新興民主。他採取三頭並進的策略。在國際面向上，李登輝採取一連串的新外交政策，諸如：尋求雙重承認，申請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暨「世界貿易組織」，出國進行非官方訪問，以及申請加入聯合國等，試圖挽救臺灣岌岌可危的國家主權地位。在兩岸關係上，李登輝則試圖呼籲中共，接受德國在一九九〇年之前的分裂國家模式，以尋求雙方的共存⁷⁰。至於在國內方面，李登輝一方面運用口號，強調「兩千一百萬人的生命共同體」，他方面則透過兩黨各自的管道，以施行大陸政策與外交政策，企圖藉此管束民進黨的臺獨狂熱。同時由於民進黨的領導階層深恐臺灣對大陸過度的資金投注以及日漸深化的貿易依賴，將會使臺灣更加受制於大陸的經濟策略，並且限縮了臺灣獨立的可能性，故而他們也默默地支持國統綱領⁷¹中所提出的禁止兩岸通商、通航的政策。而李登輝在一九九三年初決意推動臺灣加入聯合國，則是在外交政策目標上首度獲致民進黨的認同，從而在兩黨領導階層之間發展出一套新的政治合作模式。民進黨之所以積極地推動臺灣加入聯合國的原因，不只是因爲就長遠的眼光

來看，聯合國的會籍可以多邊承認的方式，永久地確保臺灣的政治自主性與領土上的安全，更因爲申請案的本身即足以作爲一個獨立建國的起點，從而彙集國人的忠誠與信心，並向國際社會傳達臺灣獨立的強烈意願。

然而中國大陸內部的政治現況卻是變化多端。長期以來晦暗不明的繼承危機，以及對於西方國家陰謀分化中國的疑懼，都促使北京的領導階層對臺灣問題必需採取強硬的立場。故而，當國民黨的領導高層正在沾沾自喜於成功地縮小與民進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差距時，北京方面卻更加地懷疑，認定臺北高層乃是意圖以隱秘而迂迴的方式達成獨立的目标。因此，臺灣申請加入聯合國的舉動更是深深地使北京方面爲之警戒。中共認爲臺灣明目張膽地企圖加入聯合國乃是一項尋求正式獨立的準備步驟。因此中共也採行了一個三方面並進的策略以爲回應：外交上封鎖臺灣，在軍事上制服臺灣，並且在經濟方面牽制臺灣⁷²。首先在外交方面，臺灣在非洲小國與中美洲國家的外交成果都立即遭逢中共的激烈抗衡。同時，北京也致力於強化兩岸商貿關係，積極地在臺商菁英之中培養出一批反臺獨的擁護者。此外，中共則不斷增加其國防預算，以強化其軍事上的攻擊能力、兩棲登陸部隊武力，以及海軍戰備。由於中共未能成功地阻撓李登輝在一九九五年六月間以非官方名義進行訪美，故隨即在臺灣北海岸進行一星期的飛彈演習以恫嚇臺北當局。一九九五年八月下旬國民黨召開提名總統候選人黨員大會的前夕，中共解放軍更在臺灣離島附近發動第二次飛彈演習。這兩次的飛彈演

習與後續的震盪效應使得臺灣股市點數迅速滑落30%，新臺幣貶值達9%，並且於七月至九月間加速資本出走的態勢。至於對反李陣營而言，中共飛彈演習則無疑是攻擊李登輝的領導、外交與大陸政策的最新利器。

無疑地，北京的強硬派希望透過一連串的威脅舉動，可以阻撓李登輝的再度當選，並且使臺灣因此而臣服於中共的武力威脅之下。在這個思考模式下，北京決定將飛彈威脅延長至總統大選當天。不料這一回合的武力演習竟然難以壓制李登輝選舉陣營的聲勢，故令北京強硬派人士感到相當失望。甚至由於許多傳統的民進黨支持者擔心，一旦大多數人民的意見不一時，海峽危機將導致臺灣淪陷於中共之手，故轉而支持李登輝，且促成李氏的再度當選^⑧。此外，由於美國決定派遣兩艘戰艦至臺灣海峽中的國際水域巡航，也相當程度地緩和了中共軍事威脅對李登輝的再當選所可能造成的傷害。然而，北京當局的軍事介入依舊在總統選戰過程中引爆一場有關於大陸與外交政策的內部論爭，並且在選舉過後營造出一股國內改革的壓力。

近年的發展顯示出，只要中共不斷地企圖影響臺灣內部的政治過程^⑨，甚至威脅必要時將使用武力推翻任何一個主張要推動臺灣獨立的民選政府，則臺灣的民主轉型過程將倍加艱辛。因此許多來自國外的非社會人士極可能跳過民主的程序，與臺灣內部社會中的部分成員達成一定的默契，為中共的政治目標進行強力的社會動員，且企圖從事社會價值的重分配。至於中共政策的執行成效，如臺灣問題香港化，則

必需視臺灣內部各個行為者的策略選擇，和中共政局在繼承問題上的動態變遷，以及國際社會是否願意為推行民主而保障少數族羣遂行其自決權利的意願等發展而定。就目前的國際情勢以觀，後冷戰時期中，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社會）中對於如何介入族羣與領土衝突始終無法發展出一套運作模式，從而能為臺灣人民所提供的保障也微乎其微。

伍、小結

整個國際體系與外來的行為者對於南韓與臺灣的民主轉型與鞏固一直發揮著深遠，卻斷斷續續的影響。由於地理位置上的遙遠與威權體制崩潰的時間差異，南韓與臺灣的民主成效並不如東歐國家般地為人注目。至於兩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以及其對外經濟關係，則同時對其產生了正、負兩面的影響；儘管兩國強烈地依賴美國的市場以及軍事協防，但由於美國的內在政經利益乃是建立在兩國的內部社會安定之上，故美國的外交政策便受到前述利益的牽制，而擺盪於是否應引導兩國進行民主改革，或是防範威權政體統治之間。

儘管分裂國家的遺緒並不必然成為南韓與臺灣在鞏固民主過程中的障礙，但也增添了不少複雜性。同時，分裂國家的現況也暗示著，兩國各自的敵對共產政權扮演著一個特殊的角色，其統一的野心乃是兩國在民主轉型歷程中最具威脅性的不安因素；這個結構上的限制使得現行政權時時處於國

際孤立的陰影之下，使兩國不得不正視國際變數對政權正當化的重要性；而兩國獨特的歷史背景，則在政權轉型的過程中對於兩國的國家統御結構引爆了正當性的危機。如果南韓與臺灣無法與敵對政權獲致有效的多邊或雙邊協議，則兩國將無法定位其國家結構，從而影響到民主轉型的遠景。尤其在臺灣，深切的國家認同危機嚴重地阻撓了各界就憲政秩序達成最終共識的努力，從而更影響到臺灣民主的鞏固。

與南韓相較，由於臺灣的民主化過程中曾就外交政策進行更動，因此分裂國家的現狀對於兩國也就發揮極端不同的影響；南韓的新領導階層積極地尋求將南北韓分裂的國家現狀予以法制化，而臺灣內部新興的政治勢力卻努力地想跳出分裂國家的影響，尋求獨立自主。這種截然不同的政治傾向不但導因於兩國在面對其敵對共產政權時不同的強弱權力對峙態勢，也是源自於兩國不同的戰前殖民經驗與戰後鞏固國家體制的影響。以朝鮮半島的情勢而言，南韓在經濟與意識形態上的優勢使得北韓在國家統一的議題上只能退居守勢。但是在海峽兩岸，由於臺灣與中共在幅員上的極端差距，卻迫使臺灣退居弱勢。因此，在臺灣政權轉型的三階段——威權體制崩潰、民主轉型過渡，以及民主鞏固的時期中，中共都或有意或無心地施展其強大的影響效應。透過國際體系的變遷，並進而影響臺灣的政權發展，中共的因素加速了國民黨政權的崩潰；然而當臺灣順勢進行第二階段的民主化時，中共卻開始擔憂臺灣內部新興的獨立熱情，轉而阻撓臺灣的民主化進展了。

對於南韓與臺灣這兩個東亞新興工業國家而言，先進工業民主國家是否願意全力地維繫朝鮮半島以及臺灣海峽的穩定情勢，乃是保障兩國民主的關鍵性因素。在安全利益、經濟利益與意識形態傾向等因素的互動作用下，兩韓關係始終不是美國、日本，與歐聯等國心目中的燙手山芋。但是在海峽兩岸關係上，由於各國的安全利益、經濟利益以及意識形態互有枱格，因此對各主要工業民主國家而言，如何妥善解決兩岸問題乃是一項更嚴苛的道德挑戰。

參考文獻

- Chen, Edward, 1972, Formosan Political Movements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1914 ~ 1937.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 3(May): 477~497.
- Cheng, Tun-jen. 1989,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42(July): 471~499.
- Choi, J. J. 1993, *Hankuk Hyupdaijungchiui Kuzo wa Byunwha* (Structure and Changes of Contemporary Korean Politics). Seoul: Kkachi.
- Chu, Yun-han. 1992. *Crafting Democracy in Taiwan*. Taipei: Insitute for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 Chu, Yun-han. 1994a. "The Realignment of 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 and Regime Transition in Taiwan". In Andrew MacIntyre ed.,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in Industrializing Asia*. Itha-

- 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hu, Yun-han. 199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 Mainland Policy. Paper presented at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oss-Straits Rela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ponsored by the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and 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March 27 ~ 29, 1995, Taipei. (朱雲漢。1995。〈大陸政策中的政治經濟分析〉發表於大陸事務委員會及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合辦之「兩岸關係對亞太地區的意義」研討會，1995年3月27~29日，臺北。)
- Chu, Yun-han. 1996. "Taiwan Unique Challenges". Journal of Democracy, 7, 3(July).
- Clarke, Donald(ed.). 1988. The Kwangju Uprising: Shadows over the Regime in South Korea. Boulder: Westview.
- Corbo, V. and Sang M. Suh(eds.). 1992.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a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y: The Korean Experi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otton, James(ed.) 1993. Korea under Roh Tae-Woo: Democratization, Northern Policy and Inter-Korean Relations. Sydney: Allen & Unwin.
- Cumings, Bruce. 1984.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dustrial Sectors, Product Cycles,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Winter): 1~40.
- Diamond, Larry and Marc F. Plattner(eds.). 1993. The Global Re-

- surgence of Democrac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iamond, Larry, Juan Linz and Martin Lipset. 1995. "Introduction: What Makes for Democracy?" In Larry Diamond, Juan Linz and Martin Lipset eds. Polit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mparing Experiences with Democracy. Boulder: Lynne Rienner.
- Haggard, Stephen and Chung-in Moon, 1990.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the Korean Case". World Politics, 41, 2: 210~237.
- Han, Sung-joo. 1975. Failure of Korean Democr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an, Sung-joo. 1988. "South Korea in 1987: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Asian Survey 28: 1(January).
- Henderson, Gregory. 1988. "Constitutional Changes from the First to the Sixth Republics: 1948 ~ 1987." In I. Kim and Y. Kihl(eds.).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 Korea. New York: Paragon, pp. 22~43.
- Higley, John, and Richard Gunther. 1992. Elit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 Fu and Yun-han Chu. 1992.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Tun-jen Cheng and Stephan Haggard, eds.,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Oklahoma University Press.
- Im, Hyug Baeg. 1990. Hankukaesoui Minjuwha gwajung Bunsuk; Junryakjok Suntaed Ironeul Jungsimuro(An Analysis of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in South Korea: With Reference to Theory of Strategic Choice). A paper presented at a summer convention of the Kore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 Institute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1993. Hankuk Jungchi Sahoiui Sea Hurum (New Trends in Kor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Seoul: Kyungnam University Press.
- Karl, Terry Lynn and Philippe Schmitter. 1991. "Modes of Transition in Latin America, Southern and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38(May).
- Kim, H. J. 1992. Hankuk Jungchi Chejeron(Thesis on Korean Political System). 2nd ed., Seoul: Bakyongsa.
- Kim, H. N. 1987. "Political Changes in South Korea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U.S.-Korean Security Relations." Korea and World Affairs. 11, 4(Winter).
- Kim, S. L. 1992. "Chung Doo-Hwn, Ryoksarul wihan Yuksung Jeungon" (Chun Doo-Hwan, A Testimony for History). Wolgan Chosen(January).
- Kim, Y. L. 1990. Hank Iiljibdan gwa Minjujungchi Baljun(Interest Groups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South Korea). Seoul: Daewangas.
- Kim, Y. C. 1994. The State and Labor in South Korea: A Coalition

- Analysi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 Lee, Manwoo. 1990. The Odyssey of Korean Democracy, New York: Praeger.
- Lee, S. J. 1991.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 Korea." Kor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20 (1): 77~100.
- Lin, Hysop. 1993. "Group Interests Get in the Way." Korea Focus 1(4): 10~16.
- Lin, Cheng-yi. 1989. Taiwan Anquan de Sanjiao Xietie(The Equation of the Triangle of Taiwan Security). Taipei: Laureate Pub. Co.
- Linz, Juan and Alfred Stepan. 1993.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 Mimeo, Yale University.
- Lowenthal, Abraham F.(ed.). 1991. Exporting Democracy: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Mainwaring, Scott, Guillermo O'Donnell, and J. Samuel Valenzuela (eds.). 1992. 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e New South American Democra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outh Be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Moon, C. I. 1989. "The Demise of a Developmentalist State? The Politics of Stabilizatio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4: 64~84.

- Moon, C. I. and M. G. Kang. 1995. "Democratization and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outh Korea: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In James Cotton(ed.), From Roh Tae-Woo to Kim Young-Sam: Politics and Policy in the New Korean State. Sydney and New York: Longman and St. Martin.
- Moon, C. I. and Y. C. Kim. 1995. Circle of Paradox: Development, Democracy, and Politics in South Korea. In Adrian Leftwich (ed.),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Moon, C. I. 1994. "Changing Patterns of 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 in South Korea". In Andrew MacIntyre ed.,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in Industrializing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oon, C. I. and S. S. Lee. 1995. "The Post-Cold War Security Agenda of South Korea." Pacific Review, 8, 2(March).
-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Korea (NCKK). 1987. 1970 Yondaiui Minjuwha Undong (5) (Democratic Movements in the 1970s), Seou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NCKK.
- Niksch, Larry A. 1987. Korean Political Crisis: Policy Alert. (CRS Report 8 ~ 523F),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 O'Donnell, Guillermo,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 (eds.). 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Pridham, Geoffrey(ed.). 1991. Encouraging Democracy: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Regime Transition in Southern Europe. London: Leicenster University Press.
- Pridham, Geoffrey. 1994.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Democratization: Theory, Practice and Inter-regional Comparisons." In Geoffrey Pridham, Eric Herring and George Sanford(eds.) Building Democracies?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Democr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Leicenster University Press.
- Rustow, Dankwart. 1970.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2,3(April).
- Schmitter, Philippe, 1991.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for Contemporary Democratization: Constraints and Opportunities Upon Choice of 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mimeo, Stanford University. September 1991.
- Seong, Kyungryung. 1993. "Hankuk Jungchi Minjuwhai Sahoejok Kiwon: Sahoe Undongjok Jupkeun"(Social Origins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Korea: A Social Movement Approach) Institute for Far Eastern Studies(ed.), pp.85~132.
- Sigur, Jr., Gaston, J. 1987. "Korean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ulletin (April).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State.
- Sohn, Hak-kyu. 1989. Authoritarianism and Opposition in South Korea. London: Routledge.
- Steinberg, D. I. 1995. "The Republic of Korea: Pluralizing Politics."

- In Larry Diamond(ed.). Democracy in Asia. Boulder: Westview.
- Tien, Hung-mao and Yun-han Chu. 1994. "Taiwan Domestic Political Reform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Power Realignment." In Gary Klintworth ed. Taiwan in the Asia-Pacific in the 1990s. Sidney: Allen & Unwin.
- Tien, Hung-Mao. 1989. The Great Transi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 Yang, Gil-hyun. 1995. "Hankukui 1987 yon Minjuwha Ihaenggws Wirubutoui Chaekryak"(1987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South Korea and Maneuvering from the Above). Hankuk gwa Kukji Jungchi (Korea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1, 1 (Spring / Summer).
- Yoon, Daekyu. 1990. Law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South Kore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注釋

-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klahoma University Press, 1991), hereafter The Third Wave;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 (mimeo, Yale University, 1993), hereafter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Philippe Schmitter,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for Contemporary Democratization: Constraints and Opportunities Upon Choice of 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mimeo, Stanford University, September 1991), hereafter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Geoffrey Pridham,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Democratization: Theory, Practice and Interregional Comparisons" in Geoffrey Pridham, Eric Herring and George Sanford(eds.), Building Democracies?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Democr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Leicen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4), hereafter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Larry Diamond, Juan Linz and Martin Lipset, "Introduction: What Makes for Democracy?" in Larry Diamond, Juan Linz and Martin Lipset eds. Polit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mparing Experiences with Democracy,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5) hereafter Polit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② Donald Share,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and Transition Through Transac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9:4 (January 1987) ; Terry Lynn Karl and Philippe Schmitter, "Modes of Transition in Latin America, Southern and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No. 138 (May 1991) ; and John Highley and Richard Gunther, Elit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③ Geoffrey Pridham, Eric Herring and George Sanford (eds.) Building Democracies?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Demo-

cr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Leicen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4); hereafter Building Democracies? p.15.

- ④ Schmitter,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Geoffrey Pridham (eds.), Encouraging Democracy: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Regime Transition in Southern Europe, (London: Leicen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hereafter Encouraging Democracy; Pridham, Building Democracies?; Linz an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 ⑤但也有一些顯著的特例。如：杭廷頓 (Huntington) 的《第三波》(The Third Wave)；戴蒙 (Larry Diamond)、林茲 (Juan Linz) 與李普塞 (Martin Lipset) 所合編的《發展中國家的政治》(Polit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mparing Experiences with Democracy,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5)。
- ⑥本文的意思並非指稱國際性因素在第一波與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中缺乏重要性。事實上，在早期的民主化浪潮中，外國勢力的介入常常是政體轉型結果的決定性因素。只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特徵即在於外來勢力影響所及的廣泛性與持續性。杭廷頓即曾經指出，在前兩期的民主化浪潮之中，不論是國內因素或是國際因素，均曾各自在推翻威權統治的過程中扮演著關鍵性角色，但兩者卻不曾同時運作互動過。參見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 p.35。
- ⑦ Linz an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pp.77-81.
- ⑧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pp.77-78.
- ⑨ Diamond, Linz and Lipset, Polit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p.121.

- ⑩ Pridham,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pp.23-25.
- ⑪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p.102.
- ⑫ Schmitter,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 ⑬ Pridham,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p.11.
- ⑭ Schmitter,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pp.18-19.
- ⑮ Pridham, Encouraging Democracy.
- ⑯ Yun-han Chu, Crafting Democracy in Taiwan, (Taipei: Institute for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1992), pp.38-44.
- ⑰ Robert E. Bedeski, "State Reform and Democracy in South Korea", in James Cotton (eds.) Korea Under Roh Tae-Woo: Democratisation, Northern Policy and Inter-Korean Relations , (Canberra, Australia: Allen & Unwin, 1993), pp.62-65.
- ⑱ Chu, Crafting Democracy in Taiwan, pp.102-109.
- ⑲ Diamond, Linz and Lipset eds., Polit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⑳ 1980年代初期，南韓與臺灣兩國各有將近40%的總出口量必須仰賴美國市場的消納；但隨著兩國在東亞區域內部的貿易量躍升至兩國總出口量的一半以上，從1993年起，兩國對美國的出口量降至25%左右。參見朱雲漢，大陸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大陸事務委員會與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合辦：「兩岸關係對亞太地區的意義」研討會論文（臺北：1995年3月）。
- ㉑ 至於美國國會則在推動南韓與臺灣的民主改革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在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索拉茲 (Stephen Solarz) 議員的關切下，臺灣的人權紀錄一再地被提出

深究。1987年6月，眾議院通過一項不具約束力的決議案，要求國民黨加速政治改革的步調，並且舉辦全國性的民意代表改選。另一方面，當1987年中漢城危機發生之時，也有數位美國參議員提案（S.R. 1392）要求對南韓施以經濟制裁，直到其開啟民主大門為止；提案中所建議的制裁措施包括中止南韓工業製品所享有的普遍化優惠關稅制度的優惠，以及美國政府不再對投資於南韓的美國公司提供政府保證。參見H. N. Kim, "Political Changes in South Korea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U.S.-Korean Security Relations", *Korea and World Affairs*, 11 (Winter 1987), p.662.

㉔ Chu, *Crafting Democracy in Taiwan*, pp.30~32.

㉕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Kauf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㉖ Hung-Mao Tien, *The Great Transi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1989); and Fu Hu and Yun-han Chu,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Tun-jen Cheng and Stephan Haggard, eds.,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2).

㉗ 這是基於一項針對在民主改革過程中，出口導向工業化政策對於執政者與反對勢力的選擇策略所產生的限制效果研究而作出的全面性分析。參見Chu, *Crafting Democracy in Taiwan*, pp.30~32.

㉘ Chalmers Johns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Robert Scalapine et al.(eds.)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Present and Future*, (Berkeley, CA: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5).

㉙ C. I. Moon, "Changing Patterns of 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 in South Korea", in Andrew MacIntyre (ed.)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in Industrializing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and Yun-han Chu, "The Realignment of 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 and Regime Transition in Taiwan", in Andrew MacIntyre (ed.)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in Industrializing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㉚ Haggard and Kauf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Moon, "Changing Patterns of 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 in South Korea".

㉛ Moon, "Changing Patterns of 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 in South Korea" pp.145~152.

㉜ Robert E. Bedeski, "State Reform and Democracy in South Korea", pp.62~63.

㉝ Chu,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 Mainland Policy."

㉞ Dankwart Rustow,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2~3 (April 1970). 道爾 (Robert Dahl) 也假定，國家是否能就其合法治理的疆域結構獲致國際間的認同，乃是民主體制得以建立、存續的先決要件。參見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07.

- ③ 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dustrial Sectors, Product Cycles,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 (Winter 1984), pp.1~40, hereafter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 ④ Linz an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pp.10~11.
- ⑤ Alfred Stepan,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 Changing Patterns in Brazi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 ⑥ Kyungryeong Seong ed., "ankuk Jungchi Minjuwhai Sahoejok Kiwon: Sahoee Undongjok Jupkeun" (Social Origins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Korea: A Social Movement Approach), in the Institute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1993), pp.85~132, hereafter "Social Origins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C. I. Moon, "The Demise of a Developmentalist State? The Politics of Stabilizatio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1989), pp.64~84.
- ⑦ A. Lee 1993.
- ⑧ J. J. Choi, Hankuk Hyupdaijungchiui Kuzo wa Byunwha (Structure and Changes of Contemporary Korean Politics), Seoul: Kkachi, 1993, hereafter "Structure and Changes"; Hyug Baeg Im, "Hankukaesoui Minjuwha gwajung Bunsuk; Junryakjok Suntaed Ironeul Jungsimuro" (An Analysis of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in South Korea: With Reference to Theory of Strategic

- Choice), a paper presented at a summer convention of the Kore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90; Gil-hyun Yang, "Hankukui 1987 yon Minjuwha Ihaenggws Wirubutoui Chaekryak" (1987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South Korea and Maneuvering from the Above), Hankuk gwa Kukje Jungchi (Korea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1/1 (Spring/Summer 1995); C. I. Moon and Y. C. Kim, "Circle of Paradox: Development, Democracy, and Politics in South Korea" in Adrin Leftwich ed.,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hereafter "Circle of Paradox".
- ⑨ C. I. Moon and S. S. Lee, "The Post-Cold War Security Agenda of South Korea," Pacific Review, pp.8~2 (March 1995).
- ⑩ Gaston J. Sigur, Jr., "Korean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ulletin,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1987), pp.23~25.
- ⑪ Larry A. Nicksch, "Korean Political Crisis: Policy Alert" (CRS Report 8-523F),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1987) 8; H. N. Kim, Political Changes in South Korea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U.S.-Korean Security Relations.
- ⑫ H. N. Kim, "Political Changes in South Korea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U.S.-Korean Security Relations"; Sung-joo Han, "South Korea in 1987: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Asian Survey, 28: 1 (January 1988).
- ⑬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Korea (NCKK), 1970 yondaiui

- Minjuwha Undong (5) (Democratic Movements in the 1970s), (Seou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NCKK, 1987).
- ④ James Cotton(ed.), Korea under Roh Tai-woo: Democratization, Northern Policy and Inter-Korean Relations, (Sydney: Allen & Unwin, 1993).
- ⑤ Institute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Hankuk Jungchi Sahoiui Sea Hurum (New Trends in Kor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Seoul: Kyungnam University Press, 1993).
- ⑥ Moon and Kim, "Circle of Paradox".
- ⑦ Seong, "Social Origins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 ⑧ Moon and Kim, "Circle of Paradox".
- ⑨ Hysop Lim, "Group Interests Get in the Way", Korea Focus, 1(4, 1993), pp.10~16.
- ⑩ Y.C. Kim, 1994.
- ⑪ Cuning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dtional Organization 38, pp.1~40.
- ⑫ C. I. Moon and M. G. Kang, "Democratization and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outh Korea: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in James Cotton(ed.), From Roh Tae-Woo to Kim Young Sam: Politics and Policy in the New Korean State, (Sydney and New York: Longman and St. Martin, 1995)
- ⑬ D. I. Steinberg, "The Republic of Korea: Pluralizing Politics", in Larry Diamond(ed.), Democracy in Asia, (Boulder: Westview, 1995); Moon and Kim, "Circle of Paradox".

- ⑭ Thomas B. Gold, "Civil Society and Taiwan Quest for Identit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1; Winckler, 1990.
- ⑮ 臺灣人對大中國意識的排斥乃是源自於兩項相關的歷史經驗，並從而衍生出其特有的臺灣意識與繼起的獨立建國訴求。首先，就是漫長的日本殖民統治經歷。日據期間，殖民政府先後主導了「去中國化」運動，以及太平洋戰爭時的「皇民化」運動，而臺灣本土菁英只有被迫臣服。在此同時，由於日本帝國透過殖民統治對臺灣實施一連串由國家主導的現代化計畫，因此相較於中國而言，臺灣早已取得了半邊陲地位。其次，由於中國於二次戰後接管臺灣全島，在政權重建與「去殖民化」的過程中所流露的「省籍歧視」，引發了臺灣人民的非議。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更凸顯出「省籍歧視」的嚴重性，再加上臺灣人民在政治地位上屢受壓制，從而在流亡海外的臺籍本土菁英中醞釀出臺灣獨立運動。參見George Kerr, Formosa: Licensed Revolution and the Home Rul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4; Edward Chen, "Formosan Political Movement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1914 ~ 1937",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3(May, 1972), pp.477~497. 又儘管許多人已然融合了臺灣本土與大陸兩地的文化，但是政府企圖運用中國化，或大陸化計畫以建立大中國意識，並壓制本土意識的努力，仍然受其省籍歧視的影響，故而成效不彰。參見Edwin Winckler, "Taiwan Transition?", in Tun-jen Cheng and Stepan Haggard(eds.)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2); Gold, "Civil Society and Taiwan Quest for Identity".

- 66 1977年地方公職選舉期間，中壢事件的發生被視為是反對國民黨的獨立競選人士在選舉活動上的一項主要突破；選舉當天夜晚，一項選票疑案引發出一場街頭運動，數以千計的民眾佔領了中壢警察局。詳見 Thomas B. Gold,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New York: M. E. Sharpe, 1986), pp.114~117.
- 67 Tien, *The Great Transition*; Tun-jen Cheng,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42(July, 1989), pp.471~499; Chu, *Crafting Democracy in Taiwan*.
- 68 Cheng,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Chu, *Crafting Democracy in Taiwan*.
- 69 在此外交衝擊期間，由於中共與美國接連簽署了《上海公報》(the Shanghai Communiqué, 1972) 與《八一七公報》(the August 17th Communiqué, 1982)，因此國際社會正式地接納了中共所宣稱的一個中國原則。參見 Cheng-yi Lin, *Taiwan Anquan de San-jiao Xietie* (The Equation of the Triangle of Taiwan Security) (林正義，臺灣安全的三角均勢關係，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89，p.20)。這兩項公報的簽署迫使臺灣無法單方面地決定未來的兩岸關係發展，更無從選擇獨立之路。
- 70 所謂「黨外」一詞原意為「政黨之外」，在此則指涉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之前所有的反國民黨政權人士的總稱。
- 71 1978年11月政府開放大陸探親，從此開啟了大陸政策的新階段。
- 72 Hu and Chu,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 73 一項針對國家認同問題的民意調查顯示，1980年代晚期大部分的民

- 眾傾向希望兩岸統一，但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時，民眾的認同傾向則出現多極化的趨勢。從數個1995年所作的民意調查可以發現，民眾在面臨統一、獨立，或是維持現狀等三種選擇時，大約有17%到25%的成年民眾支持獨立。而從另一項由民進黨所作的民意調查中則可以發現，在回收的有效問卷中，有26%的民眾傾向獨立，29.1%的民眾期盼將來兩岸統一，而有18.4%的民眾希望維持現狀。參見：《中國時報》，1995年8月4日，版4。
- 74 由於李登輝不願黨內大老的可能反對，提名李元簇為其總統大選中的競選夥伴，因此主流派與非主流派之間的權力競爭也就更形白熱化。非主流派人士宣稱將推出另一組正、副總統候選人與李登輝抗衡。參見 Hung-mao Tien and Yun-han Chu, "Taiwan Domestic Political Reform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Power Realignment", in Gary Klintworth (ed.), *Taiwan in the Asia-Pacific in the 1990s*, (Sidney: Allen & Unwin, 1994).
- 75 同上。
- 76 參見：林濁水，〈總統直接民選與憲政制度的重建〉，中國比較法學會研討會論文，1993。
- 77 新黨乃是於1993年8月自國民黨分裂出的一個政黨。
- 78 Yun-han Chu, "Taiwan Unique Challenges", *Journal of Democracy*, 7(July, 1996).
- 79 Diamond, Linz and Lipset (eds.), *Polit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80 Chu,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 Mainland".
- 81 國統綱領於1991年2月間公布實施。由於國統綱領中要求中國大陸

應先滿足三項要件，方得開放三通，因此使得兩岸協商陷入僵局；。這三項要件是：正式宣稱不以武力對抗臺灣，承認臺灣為一對等的政治實體，以及給予臺灣加入國際社會的合理活動空間。

- ⑫這是中共副總理錢其琛在對臺事務工作小組1994年年會中所發表的演講聲明。參見：《明報》（香港），1994年5月14日。
- ⑬大部分的民意調查都顯示，在李登輝所獲得的54%有效選票中，至少有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乃是來自於傳統的民進黨支持者。如果從大選結果的總和統計來觀察則更明顯，因為民進黨的國大代表總得票數與總統候選人的得票數間差距更達9%。
- ⑭北京當局一直明白地表示其政治目標。在一份官方文件中，北京更呼籲全國「要以經濟影響（臺灣內部）政治，以人民影響（臺灣的）政府」。

鞏固第三波民主：趨勢與挑戰—— 國際面向的觀點

作者：麥克·品多·杜辛斯基

（Michael Pinto-Duschinsky）

譯者：張錫模

「所有已然發生的失敗皆源自一個因素：外力干涉了內部的齟齬。諸民族更劃一地譴責（某對象），諸政府更一致地追求（某共同目標）……等經驗是從未有過的。……歷史上，總是充斥著因為善意介入而導致的國家災難。外國常以對手國的名義行事而摧毀了後者，就算剛開始時他們為對手國帶來了儼然的勝利，最終仍只是有效地摧毀了後者。」^①

上述這段引言，係日後出任英國外長與首相的索爾斯堡勳爵（Lord Salisbury），在一八六二年回顧自拿破崙戰爭以來的國際關係時，所說的一部分。這段引言充分表現出，一國影響他國內政的企圖，早已司空見慣。對於這種內政干涉行動是否正當或有效的論辯，也已然存在多時。然則，不論是對或錯，索爾斯堡勳爵更關心的應該是，他是否有機會